

香港傳真

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08-46

2008年6月10日

顧准在當前改革中的鉅大現實意義 —— 紀念中國改革開放 30 週年

高建國¹

1974年，文革第九個年頭。一個寒風肆虐的冬夜，一代哲人顧准含冤而逝，溘然消失於文革專制主義的黑暗谷底。

顧准無幸再生存四年，目睹他憧憬已久的改革大潮，在中國的黃土地上湧動、奔騰。然而，他於生命最後階段留下的吉光片羽，他對中國改革偉業所作的超前思考，已足可使一代知識分子洗刷恥辱，使後代學人自豪地回應大千世界：誰說20世紀下半期，中國沒有批判的獨創的思想家？中國有顧准！

¹ 此文基礎為〈顧准最大的理論貢獻是什麼〉，載《讀書》雜誌2005年第二期。2008年5月修訂並增補兩千餘字後，改題為〈顧准在當前改革中的鉅大現實意義——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週年〉——作者註。

今天，活躍在改革開放風口浪尖上的知識精英，幾乎無一例外都受過顧准的鉅大影響。而如何認識這位改革先驅的思想遺產，也日益引起體制內高層設計師的密切關注。這既是時代進步使然、思想解放使然，也是改革深化使然。

舉一例為證。2004年夏，前國務委員、中顧委常委張勁夫，即曾寄贈他耗費兩年編成的文集《嚶鳴·友聲》。² 翻開精美的卷帙，拙著《拆下肋骨當火把——顧准全傳》³ 的後記〈中國有顧准〉，竟忝列“友聲篇”篇首。張老在“友聲篇”中，並同時編發三位著名前輩學者有關顧准的大作，形成醒目的專輯。那三篇琬琰之作分別是：王元化先生的〈《顧准全傳》序言〉，陳敏之先生的〈《顧准文存》未刊序言〉，李慎之先生的〈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〉。張老作為中國有影響力的改革元老，以此不平凡之舉推薦顧准，說明為中國改革的良性發展計，研究顧准已是不少改革開放設計師的現實需要。

思想、學術乃天下之公器。顧准以人為本，對中國改革大業所作的全方位思考，對21世紀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所作的深刻闡發，在中國首倡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互滲論等等，尚未被廣大讀者充分關注。我試藉此文，展現他的部分華采樂章。

一

正如克羅齊（Benedetto Croce）所說：“史家對以往史實的興趣，永遠和他對當前生活的興趣連成一體。”顧准生前對東西方文明史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史、世界現代化發展史，孜孜不倦進行全方位探源研究，正是由於他對中國向何方去、中國將建成

² 張勁夫：《嚶鳴·友聲》，中國財經出版社2004年。

³ 高建國：《拆下肋骨當火把——顧准全傳》，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。

怎樣的現代化國家，寄予悠深的關注，懷有鉅大的隱憂。這種以求真知為至高宗旨的憂患意識，與他曲折的人生經歷有關。

顧准於滿清帝制被推翻後第四年，降生於上海一個新移民家庭。他在以英王的法語讀音命名的愛多亞路（該路曾為中、西語混雜的“洋涇浜英語”濫觴地）當小學徒時，便強烈感受到中國陷於新舊觀念、東西方文化夾擊下的尷尬與幸運。而當祖國被日寇鐵蹄踐踏時，他又從早已許身的歐美會計學，⁴轉而信仰從蘇俄傳入的馬列主義，矢志為苦難同胞建立一個理想國……特殊的人生際遇，造就了他終身服膺的愛國情懷，也造就了他多元複合的學養結構與心智系統。因此，他特別能感受夢想騰飛的中國那顆因煎迫而滾燙、卻時時“失律”的心。

1956年，中國引進蘇式計劃經濟剛四年，顧准便敏感地發現：這個新體制缺乏科學性，阻塞了商品經濟血脈，對新中國發展不利。由於馬克思曾指出，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不可兼容，而計劃經濟體制便建立在這一頗具“神聖”性的理論基礎上，顧准先在日記中，秘密地對計劃經濟發起連續批判：“社會主義經濟問題，目前那一套規律是獨斷的，缺乏繼承性的，沒有邏輯上的嚴整性的”，“是離開……價值規律的空東西”。他繼而出於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考慮，公開撰文指出，新中國如要達到經濟現代化，必須以市場價格的自由漲落調節生產與流通，與人類公共的價值尺度接軌。⁵顧准這一出格的經濟思想，曾推動他的老友——“新中國價值規律之父”孫冶方提出價值規律學說，⁶並導致孫冶方

⁴ 西方思想家桑巴特（Werner Sombart）認為，現代會計學被世界接受，是人類一次革命。

⁵ 顧准：〈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與價值規律〉，《經濟研究》1957年第五期。

⁶ 張勁夫：〈關於顧准的一件重要史實〉，《文匯報》1993年7月9日。

在“四清”中被康生定為“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”。而文革後，以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為首的中共改革元老，在中國掀起經濟改革大潮，則與孫冶方的這一理論密切相關。

顧准雖為中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人，當年卻因逸出主流意識形態的種種“罪行”，成為我國獨一無二的兩次戴帽“右派”。不斷昇級的政治批判，逼迫顧准將研究重心從經濟轉向政治與文化，毅然站到共和國理性批判的前沿。

顧准欲從歷史積澱中，掘出現實病症之源。他 1956 年便曾反思，洋務運動以來的革命家過於“單純”——思想本不豐富，又不“珍重遺產”；思維方式簡單而激進；行為模式則習慣以“亂到極點”來追求衝擊力。他曾為此大聲呼籲：“認真來一個百家爭鳴，是可以補過去啟蒙運動單純之不足的”。⁷ 因此，顧准絕不願簡單化看待使他墜入苦海的那一幕幕歷史悲劇。他深感，共和國正與他一樣支付著慘重代價。共和國的現代化步履蹣跚，與晚清的“自改革”歷盡劫波也難成效，事雖不類，病脈有似，都應首歸指導思想與理論夾生（當然還有相關的政治體制痼疾）。

顧准潛心研究希臘城邦制度，便是要將人類社會最早的民主政制，與中國傳承千年的專制政制參照比較，以此洞開理性批判的突破口，穿越濃重的歷史迷霧，辨明中國正確的發展方向。⁸

正是這種思想家的修養與尊嚴，使顧准在萬馬齊喑、一切學術活動均被窒息的文革歲月，拿起“用鮮血作墨水的筆桿子”（顧准語），深入剖析毛澤東晚年屢犯錯誤的思想根源。毛澤東不僅迷戀中國專制文化，他久懷學超西方的不成熟幻想，也是“楚太子有疾”要害所在——毛澤東曾挖苦張聞天，猶如枚乘筆下的楚太子，因不懂要言妙道而患疾，其實倒是恰當不過的自諷。

⁷ 顧准：《顧准文存》第三卷，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2 年，第 93 頁。

⁸ 顧准：《顧准文集》，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，第 191 頁。

針對中國於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，兩次不惜任何代價，企圖通過大躍進與文革，推行類似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，建成色彩雜駁的“公社”體制，實現終極理想社會的做法，顧准一針見血地指出：馬克思以極大熱忱讚許的巴黎公社，是為法國大革命還願；而偉大的法國大革命，不幸具有一個致命傷：“國民公會集立法和行政於一身，它是古羅馬式的、由代表組成的直接民主機構。”這樣，羅伯斯庇爾就是取勝，“自己會變成拿破侖”。顧准並借用蘇聯的沉痛教訓，論此證彼：如果不把民主看作完成政治決定的憲政制衡制度安排，僅僅空懷“人民主權”理想，追求盧梭式高調民主，勢必是“一切權力歸蘇維埃，嬗變為一切權力屬於黨，再變為一切權力屬於斯大林”。而中國文革，在專權政治條件下追求直接民主等至善理想，正是它如野馬脫韁一般，不可阻攔地奔向災難深淵的最根本原因。⁹

顧准率先在理論高度，說破了文革內核深藏的極左癥結（也是其他推行極左路線國家的深層癥結）。與直接民主、高調民主有關的“總意志說，使領袖和他的民衆能夠有一種神秘的等同”（羅素Bertand Ruseel語）。正是這種特殊的社會文化心理，為文革的順利發動與長期持續，提供了條件。顧准並據此率先剖析了，直接民主在專權控制下的衍變形式。¹⁰ 顧准建樹的這座理論燈塔，為中國今後如何徹底避免文革浩劫重演，實施可操作的民主（憲政制衡民主）與法治（rule of law）制度，在理論上指明了道路。這是他不可磨滅的思想貢獻，其意義甚至超過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闡述。

“不是只有經濟基礎才決定上層建築，上層建築也能使什麼

⁹ 顧准：《顧准文集》，第 354、372 頁；高建國：《顧准全傳》，第 519 頁。

¹⁰ 國際學界歷來認為，直接民主只有三種主要形式：美國鄉鎮會議、俄國村社與法國巴黎公社。

樣的經濟結構生長出來或不生長出來”。顧准這樣向國人點題。¹¹

其實，顧准早在1964年“四清”運動前，就已通過譯介熊彼得指出，中國現代化究竟需要怎樣一種民主制度，國人亟應重新啟蒙。追求直接民主和高調民主，潛伏著不容低估的危險，嚴重時可導致大規模政治動亂。顧准實際就是以理性拓展的歷史眼光，對“文革”浩劫可能爆發，發出了預警。

請看顧准精心譯出的以下文字：“群集心理現象決不限於拉丁市鎮狹隘街道上騷動的暴民”。當憲政精神缺失，在群集影響下，“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覺方法突然消失，……使我們面對誰都知道、可是誰都不願正視的各種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實”。各種組織和會議“都呈現出某些群集暴民的觸目特色”；各種職業的人都可能“進入某種癡狂狀態，企圖在這種狀態下引導他們走向理性論證，只能更加煽起他們的獸性”。“公民在政治事務上，還會屈服於超理性或非理性的成見和衝動……變得比平常更為非理性，更不負責任。在某些危急存亡時期，這對於他的國家也許是致命的。”“混水摸魚的諸集團的機會愈多”，那些“對控制政治戲劇、或在這場戲劇中對買空賣空有興趣的人們”，就愈加能改變甚至“創造出人民的意志”。“‘不可能愚弄所有的人民’這一格言中是有真理的”，但是，“所有的人民在短期內是可以一步一步被‘牽著鼻子’，走到他們真正不想要的某種狀態中去”的。¹²

這活脫脫就是在描繪被四人幫等人愚弄的群眾運動！然而，令人慨嘆的是，顧准在孫冶方積極支持下，剛把譯著送交商務印書館，便被第二次打成“右派”，重新下放勞改，使這部重要譯

¹¹ 顧准：《顧准文集》，第318頁。

¹² 熊彼得著，絳楓（顧准）譯：《資本主義、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》，商務印書館1997年，第321~331頁。

著的出版，被整整擱置了15年。

難能可貴的是，顧准身處文革運動反文化的大荒唐環境，卻又以步步格致的憬悟之心指出，中國如要迎接現代化的“神武景氣”，¹³光著眼於制度重建遠遠不夠，還須重視意義層面的人文重建。為此，他把他傾心的西方文明支柱，一一介紹給後人：倡導個人尊嚴與獨立、講究權利與義務誓約的日爾曼騎士文明，“是西方傳統中的個人主義等等的淵源”。“有一種個人主義在中國很少見”，“像布魯諾那樣寧可燒死在火刑柱上不願放棄太陽中心說”，像基督教的“清教徒那樣，把賺錢、節約、積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”。而希臘混合型海上文明，具有內陸文明難以追比的政治寬容性、契約共享性與文化流動性。內陸文明的對應性缺陷，正是先秦自由辯論無法形成邏輯思維之因，也是許多中國人至今文化心理褊狹麻木之因……這些人文制約因素，都與“現代條件”相悖。未來中國的改革家，必須打破對資本主義文明支柱的排斥懼怕心態。¹⁴民族自主的真力量，恰恰來源於融會他者的文化意識與價值判斷。

顧准鞭辟入裡地指出，中國傳統文化之大弊在於“服從政治權威”，卻曾因缺乏大量第一手資料，誤以“史官文化”涵蓋主流文化傳統，造成批判的武器偏宕，對傳統文化進行了過度批判。但他絕不主張“全盤西化”，更鄙視食洋不化的照搬學風。他在痛詆中國文化積弊時指出：歷史也給中國人留下了“很大的好處”——民族的根本性永存。¹⁵

顧准預見到文革失敗後，中國定將興起新一輪學西熱潮，便以典型的中華文化心態提醒：雖然西方文化的主要資源是個人主

¹³ “神武景氣”指日本於二戰後十年的突飛猛進。

¹⁴ 顧准：《顧准文集》，第293、379、282頁。

¹⁵ 顧准：《顧准文集》，第252、323、191頁。

義，長期倡導群體倫理的中國，應大膽鼓勵個人倫理；但是，個人主義也有“不顧大體”、“自相殘殺”的負面作用。¹⁶ 中國人切不可從此極端走向彼極端，把損人利己、掠奪大眾、破壞社會公正、“在待人接物中背信棄義”等，也當作合理行為。他殷切告誡後人：應當“論及人性善與惡的兩個方面”，樂觀地“考慮人性中善良的一面”，承認道德在公共交往中的重大作用，承認利他也是動力。

顧准正是沿著這樣一種思想路徑，超前研究了“道德人”與“經濟人”問題。這既關係未來的市場秩序，也牽涉未來的普遍價值與人文精神。他極其讚賞偶然獲閱的鮑爾丁(Kenneth E Boulding)的英文近著《作為道德學的經濟學》，以熱烈而鄭重的口吻，向中國未來的市場經濟社會，預先發出箴言：在個性解放、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社會，人應當成為“經濟人”，也必須成為“道德人”，否則定將引發鉅大災難。中國沒有市場調節不行，沒有道德和共同價值調節，肯定也不行。政府並應在市場模式自由經濟中，扮演積極（消極的積極）的角色。這正是他作為第一流思想家，在闡述歷史奧義的緊要關口，出於對中國改革事業的深刻認識、對德性倫理與權利倫理的雙重考慮，表現出的冷靜與出眾。¹⁷

顧准認為自己對中國未來的制度重建與人文重建，都負有一種近乎神聖的思考與言說使命。而他在文革大黑暗中無私無畏地存在與堅持，本身便是人文光芒的不朽體現。

二

王元化先生曾在顧准遺作序言中讚美顧准：“對於從1917年

¹⁶ 顧准：《顧准文集》，第287、201頁。

¹⁷ 高建國：《顧准全傳》，第653頁。

到 1967 年半個世紀的歷史，……都作了認真的思索”；“許多糾纏不清的問題，經他一點，立即豁然開朗，變得明白易曉”。之所以如此，與顧准以中國悲劇為養料有關。他曾為中國革命獻身，親見共和國接連發生一幕又一幕悲劇，怎能不以個中人的深切感情，進行系統反思？正是一陣比一陣劇烈的心痛，促使他動筆。而心痛達到極致，便是理論的開端。所以他說，最好的學者應當具有如冰的理性、如火的激情。

顧准對中國問題的穿透性認識，源於他對中國國情的獨到理解。他睿智地點撥世人，欲知中國問題本質，必先認清中國的“亞細亞”特徵。如此，便可萬丈深淵探驪得珠。

由於我國理論界對“亞細亞”社會的有無，看法始終不一，顧准再三強調的這一命題，至今也未引起應有關注。其實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早已證實，“亞細亞”“獨特”模式在中國自古存在。¹⁸ 中國文明的興起與西方不同，歷史上也迄今未見西方意義的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。這些事實充分說明，馬克思等人對“亞細亞”模式的論述，雖不盡準確劃一，卻足以巋然存世。還是顧准說得好：“考古學時代，把古代史的面貌徹底更新了”，思想史研究應做相應調整。

衆所周知，規劃一國的現代化藍圖，必須充分考慮它的歷史母斑及相關國情。如何走好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的課題，迫使我們不能不回頭，重新關注顧准強調的“亞細亞”問題。

顧准憑藉他對共產國際文化的熟知，向世人嚴肅指出，被斯大林一棍子打成“偽科學”，而嚴禁使用的“亞細亞生產方式”與“亞細亞社會”，卻是馬克思多次使用的概念，¹⁹ 專門說明在

¹⁸ 張光直：《古代中國考古學》，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2 年，第 24、441 頁。

¹⁹ 此前，亞當·斯密、約翰·斯圖亞特·穆勒（J.S.Mill）與理查德·瓊斯（R.Jones）等學者，已使用這一理論。

地緣歷史影響下，不少“東方”國家的社會形態與經濟、文化特徵，與西方社會科學的經典概念相去甚遠。²⁰

按照馬克思與理查德·瓊斯、約翰·斯圖亞特·穆勒、亞當·斯密的說法，屬於“亞細亞”社會的中國等國，與屬於“半亞細亞”社會的俄國等國，由於文明進程、生產方式與社會轉型方式“特殊”，政治權威與國家機器自古具有超常的統治力，經濟、文化均受制於政治。私有財產始終處於軟弱地位，雖然也存在土地私人佔有，“國家卻是真正的地主”（馬克思語）。雖然形成分散的小農經濟，政府卻是最大的公共工程部門。以集權君主為代表的政治權威，享有極大的自覺性自由，對臣民的財產乃至人身權利，具有“最高”支配權——猶如黑格爾形容，是一種“普遍奴隸制”。²¹ 而這些，都是中、俄現代化要面對的大問題。

耐人尋味的是，也許由於馬克思關於“亞細亞”社會既非封建主義亦非資本主義社會的闡述，可能約束已經湧現革命高潮的俄國，去建立社會主義社會；也許由於普列漢諾夫曾經警告，布爾什維克全面實行土地國有，並推行使“國家官吏成為一切生產管理者”的政策，可能促使“亞細亞復辟”²²……列寧便逐漸減少了他對“亞細亞”、“半亞細亞”概念帶有偏愛的採用，而將舊俄國改稱為“資本主義前期”或“資本主義”社會，也不再論及

²⁰ 馬克思：〈《政治經濟學批判》序言〉，《馬恩選集》第二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，第83頁；馬克思：〈致恩格斯〉（1853年6月2日），《馬恩全集》第28卷，人民出版社1963年，第256頁。

²¹ 馬克思：《資本論》第三卷，人民出版社1975年，第370~373頁；馬克思為《紐約每日論壇報》寫的數篇述評，《馬恩全集》第九卷，人民出版社1965年，第110、144~148頁。黑格爾忽視了“禮”、“法”（rule by law）以及中國文官制度對中國皇帝的約束，但包括中國皇帝在內的“東方”帝王，確實享有西方人難以想像的權力。

²² 中、俄建國後的歷史證明，普氏之憂絕非杞人憂天。而毛澤東用“亞細亞”式專制手段，去解決“亞細亞”式官僚主義，只能弄得一團糟。

中國的“亞細亞”屬性。然而，頗為惹人矚目的卻是，列寧本人晚年親見俄國建設經典式社會主義艱難萬分，重又恢復強調俄國的“半亞細亞”屬性，他的新經濟政策便與此有關。列寧用生動有趣的比喻，調侃那些百般迴避“東方”“特殊性”的人，“像小貓在熱粥旁邊繞圈子一樣”，難以嚐到真理的好滋味。²³ 但是，斯大林卻爽性於1938年，以“地理環境不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的決定原因”為由，強制取消了一切“亞細亞”提法，把沙皇俄國硬性地稱為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（斯大林於1926年，便已強調中國社會的“封建”性質）。斯大林力圖說明，俄國封建主義社會被資本主義社會代替，資本主義社會又被社會主義社會代替，完全符合“五階段論”發展規律。於是，“亞細亞”問題被專制文化徹底掩蓋了。²⁴

一貫堅持“亞細亞”基本理論的顧准，回顧這一段曲折的歷史公案，無比辛辣地嘲諷：“斯大林斬釘截鐵地不准談‘亞細亞的’，於是對馬克思，亦即對歷史的強姦完成了。”²⁵ 顧准實際上就是提醒後人，日後如能僥倖讀到他的遺墨（他是“牛鬼蛇神”，沒有任何寫作權利，也不能指望文稿長存），必須下大功夫研究“特殊性”中國。明辨其先天長處與缺陷，發現其潛在動力與危機，這才是正確規劃中國改革的重要前提。

一方面積極倡導主動接受西方各種重要的普世價值，一方面反復強調認真研究中國自有的“亞細亞”“特殊性”，正是顧准作為改革思想先驅的過人之處。近當代中國已多次領教偏廢造成

²³ 列寧：〈什麼是“人民之友”〉，〈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〉，《列寧文選》第一卷，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，第97、722頁；〈論糧食稅〉、〈日記摘錄〉，《列寧文選》第二卷，第859、866~867、1000頁。

²⁴ 斯大林：〈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〉，《列寧主義問題》，人民出版社1971年，第644~645頁。

²⁵ 顧准：《顧准文集》，第285、83頁。

的危害。

據顧准的老友、仍健在的學部委員駱耕漠老前輩介紹，顧准一直認為中國與西方歷史軌跡大異。中國既然不能變成西方那樣的社會形態，就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經典中的社會發展理論，而應形成自己的“結合型”現代化理念。為此，顧准曾想撰寫一部比較中、西歷史道路的專著，全面闡述他的看法，但他來不及了。

顧准集中闡述“亞細亞”問題，已處於生命最後階段。雞蛋大小的癌腫緊緊卡在心臟與氣管之間，使他不能順暢地呼吸，且因咯血過多而數次輸血。可是，他卻在使命感與責任感推動下，進行著最後的拼搏。他每天不是在簡陋的斗室堅持寫作，就是懷揣兩隻冷饅頭，艱難地前往北京圖書館讀書。他 59 年生命的絕響，便是一篇論述“亞細亞”問題的專稿。這是他作為中國 20 世紀後半葉，最重要最具啟發性思想家的“天鵝之歌”（雖然此歌有些地方不甚完整）。

顧准揮筆據實指出，中國從大陸式部族公社，發展成東方型“專制務農領土王國”，根本沒有西方奴隸社會中的自由民（西方許多文化理念由此產生）。而且，“中國從來沒有產生商業本位的政治實體”。就連西方意義的國家學說，也很難適用於“中國歷史和現狀”……總之，中國歷史軌跡與西方歷史“一般”道路比照，頗顯“特殊”。²⁶ 顧准大聲呼籲：務必以持恆之心努力克服中國特有之弊，並深析中國的歷史內涵與優勢。而顧准的警告更顯得寓意深長：千萬不要忘記亞里士多德、馬克思等西方思想家，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寫作的！²⁷

其實，馬克思早已用譏諷的語氣指出：某些蹩腳的宣傳家，把我的“歷史概述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，一切民族，

²⁶ 顧准：《顧准文集》，第 291、252、317 頁。

²⁷ 顧准：《顧准文集》，第 290、318、256 頁。

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，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……他這樣做，會給我過多的榮譽，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。”²⁸

歷史與現實告訴今天的中國改革者，顧准的警告、馬克思的譏諷，適用於各色各類西方思想家。“亞細亞”問題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“特殊”國情問題。擁有十數億人口的“亞細亞”中國，只能走符合自己國民實際需要的現代化道路。

顧准站在一個“中國人的立場”，對世界“兩大潮流”反復回顧、體驗、比較、思考後，以俯瞰人類文明長河、超越歷史局限的氣勢指出：“一百多年的歷史，證明兩股潮流在交叉。1917年的革命無疑對資本主義形成一股強大的衝擊力量，沒有這種衝擊，西方的資本主義不見得會在其內部產生一股民主福利國家的潮流，至少，這股潮流不會強大到目前那種正在緩慢地改變資本主義面目的程度。奇怪的是，衝擊了西方資本主義的這股潮流，本身也在演變，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，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轉化過去。我不相信，它真能轉化到它的反面。看來，互相激蕩的兩股力量，都在推動歷史的前進；兩股力量，正在互相滲透，滲透的結果，都促使它們向前進。沒有激蕩，沒有滲透，進步就不可想像了。”²⁹

顧准並以平實而深邃的語言進一步揭示：在追求歷史進步的過程中，應當採用“徹底經驗主義”態度，把多元主義“貫徹到一切科學研究和價值判斷中去”。³⁰這是他多年堅持“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所悟得的要旨。

²⁸ 馬克思：〈給《祖國紀事》雜誌編輯部的信〉，《馬恩全集》第19卷，人民出版社1963年，第130頁。

²⁹ 顧准：《顧准文集》，第373~374頁。

³⁰ 顧准：《顧准文集》，第424、346頁。

三

通觀顧准晚年遺訓，我們可知，這位思想先行者在中國大悲劇的極端年代，曾以杜鵑啼血式的諍言，力主市場經濟、制衡民主與多元文化等等，倡導超越既有的社會主義模式，在中國實行全方位深度改革。但是，他對未來中國可能簡單仿效西方資本主義，也懷有亡羊歧路般的隱憂：“通過資本主義來現代化，必然要鼓勵創業精神和牟利動機，必然要把資本主義的積累看作人類的福音。可是資本主義把社會積累‘委託’給資本家，這種積累，資本家有權無限制地加以動用，……人類比二百年前聰明一些了，殘害兒童（指剝削童工——引者註）已經不能容忍了，所以，新興國家怎樣現代化，資本主義老路走得走不得，已經成為一個嚴肅的問題了。”³¹ 由此我們可知，顧准高瞻遠矚，力主接受資本主義諸多長處同時，也倡導批判既有的資本主義模式，希冀以中國改革的實踐經驗，探求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。

請看顧准如何以他成熟的思考，對未來世界的現代化畫龍點睛，諭示後代中國人：“到本世紀（指20世紀——引者註）以後，就不再純粹是接受資本主義的問題，而成為一個更廣泛的‘現代化’問題，可以有資本主義道路的現代化，也可以有社會主義道路的現代化，還有50年代以後新興國家的特殊樣式等等。”³² 顧准以沉痾攬摧之軀，屏足生命全部餘力，高擎思想火把：“清醒地看到問題所在，……實事求是，而不是教條主義地對待客觀實際，我們國家不久就會在經濟上雄飛世界！”³³

顧准在生命的最後艱難時刻，曾多次向友人坦露心跡：我的

³¹ 顧准：《顧准文集》，第330頁。

³² 顧准：《顧准文集》，第326頁。

³³ 顧准：《顧准文集》，第330頁。

研究，主要為中國改革，其次為人類進步。

顧准以人為本，在理論研究上先破後立，首倡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互滲論，將經驗主義哲學舊瓶裝新酒，為中國政、經、文全方位改革所作的一系統創新設想；充分重視中國“亞細亞式”“特殊”國情，在思想構築中率先提出，西方意義的“現代化”可有“更廣泛的”多元樣式，為符合中國民衆利益的中國特色現代化，所作的極具啟發意義的前瞻思考……無疑構成了他最傑出的理論貢獻。

遍覽 21 世紀全球現實，我們可見，中國正向縱深發展的改革大業；瑞典與奧地利建立的“雜交型社會主義”社會；美國學者羅爾斯（John Rawls）創立的“公平正義合法的自由主義”思想……無不證明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互滲成果，富有生命力與歷史推動力，也證明了顧准超前 30 多年為中國所作的改革思維，兼具批判性與獨創性。

然而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，不論表現為制度、政綱或思想，都可歸入近二百來年起源於西方的兩股大潮流。“亞細亞”特徵所揭示的“東方”屬性，則為中國改革者在更漫長更宏大的歷史畫卷上，提供了新思維空間。這兩股大潮流與東西方多元文化，在改革平臺形成的“平行四邊形”關係，將 21 世紀“更廣泛的‘現代化’”問題，提昇到一個嶄新的理論高度。有誰能說顧准的思想作用滯留於 20 世紀？又有誰已在這一思想維度超越顧准？

人們不免要問，21 世紀中國特色現代化的具體模式，在顧准心中究為何規何矩的藍圖？天不假年，這位受盡磨難的先哲未及細緻描繪，便帶著他的憧憬與秘密悲慘地謝世了。抑或，彼時的顧准，以其“徹底經驗主義”哲學立場，已覺無需贅言。他期待後人接續著思考下去。

顧准齋志而歿，距今已 34 載。現在，我們正面對西方意義的

“全球化”。記得 2001 年初夏，龍應臺女士由臺灣來上海，雅集漫談中國現代化。我曾對她說，中國現代化，起碼有四大問題亟需解決：一是政府決策進一步民主化、科學化；二是知識分子消除思維模式上急功近利的激進主義痼疾；三是各界有識之士重燃啟蒙火炬，在理念上徹底梳理清楚，什麼是中國應走的現代化道路（“亞細亞”與國情問題，迄今未見力作，何為正確可行的中國現代化，各方歧見甚多）；四是新一代改革家如何在經驗基礎上，再次高舉弘揚根本價值與民族共識的理想旗幟（顧准曾指出：“理想主義也可以歸到經驗主義裡面去”）？其實，這都是顧准留給大家的老課題。

中國改革釋放的能量令人驚嘆，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。以致一些中國人今天已經做起“大國崛起”、“改革樣板”之夢。然而，中國改革遭遇的屏障、引發的衝突、蘊藏的危機，也極其嚴重深刻複雜，不容稍有忽視。

市場經濟規範化秩序尚未健全，民主制衡（憲政民主）與法律主治（rule of law）尚待深論，現代公民意識尚需啟蒙，人文精神卻已急劇衰微。比腐敗浪潮更可怕的是集體心靈淪落，“專家沒有靈魂，縱慾者沒有心肝”，韋伯（Max Weber）恐懼的“市場廢物文化”提前出現。中產階級未能健康發育（顧准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會計學名著，已反復倡導民族企業家合法經營、科學發展）。³⁴“三農”問題普遍突出（顧准曾多次抨擊剝削農村完成城市現代化的做法，並呼籲保護廣大弱勢群體）。西方文明中的個人主義，被曲解成無範與非義，甚至是無視底線的“自由權

³⁴ 顧准：《中華銀行會計制度》，商務印書館 1940 年，第 53、412、428 頁；潘序倫等編著：《所得稅原理及實務》，商務印書館 1937 年，第 2~4 頁（從事中共地下工作的顧准參與編著此書，但不署名。有關說明參見顧准：《顧准文存》第四卷，第 57 頁）。

利”。華夏文明的宏根大系，被棄之如廢祠荒塚，或供之為媚俗擺設（顧准曾試圖將傳統文化中的民本主義、經驗主義、仁義與誠信觀念等資源，進行現代化轉化）。還有中國無法迴避的資源與效率矛盾，人口與就業衝突（顧准對這些問題也有過警示）……都在阻礙改革順暢地大步向前。

而單一強調經濟效率、容忍權力尋租的某些“改革”，甚至使改革的合法性也遭受質疑。幻想以“超低交易成本”帶來的經濟奇蹟解決一切，已被大量嚴酷事實證明只是幻想而已。如何在長期迴避的政治改革領域有所突破並循序漸進，使改革真正成為人民的改革，合法合理解決明顯暴露的舊弊新症，讓改革健康持續地發展下去，是新一代改革家必須正視的大問題。否則，種種欠繳的改革“成本”，有朝一日難免變成累積難償的“高利貸”。

中國難道還要再歷經一次“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”的大跌宕過程麼？當改革正在過大關時，我們追循顧准的思想軌跡，或可增加沉潛往復研究中國國情、中國改革的信心。

不少學者都曾關注顧准思想中，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想成分和諧共存的現象，並為之爭論，對自稱“徹底經驗主義者”的顧准，究竟如何定位。無論在顧准思想中，社會主義（而非斯大林主義）抑或自由主義成分多些，都是可以研討的思想學術問題。但一切真誠而有責任心的改革者，對顧准倡導的改革要道，並無鴻溝鉅壑般的歧義。

改革思想先驅顧准，在文革專制與動盪歲月，因言獲罪、積憂而亡，帶走了智慧，也帶來了啟迪：只有允許知識分子群體自由討論、公開批評，中國社會才能穩定與繁榮。

回顧已逝的極左年代，胡風發瘋，老舍投湖，鄧拓自縊，陳寅恪緘口待歿，熊十力減食而亡，儲安平下落不明……那一代中國知識精英，惟有顧准撰寫了一部思想鉅著，代表蒙難的思考群

體發出了聲音。

李慎之先生生前指出：顧准對中國未來“要走的 đường 的前景，作了全面透徹的分析”；“顧准的名字必將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指路明燈”，“其意義是無論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的”。他殷切叮囑我們：“按照顧准開闢的方向，做中國現代化，特別是民主化的理論研究工作”。³⁵

不久前剛仙逝的王元化先生，則諄諄教誨我們：為尚不瞭解顧准的國人介紹顧准生平、詮釋顧准思想，就是做重要的“新啟蒙”工作（他曾建議將拙著《拆下肋骨當火把——顧准全傳》，命名為《苦難的傳奇》，以凸顯改革思想先驅的苦難遭遇與殉道精神）。元化先生並了然預言，今後數十年，顧准定將在中國思想界發揮更大的、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因為，顧准對中國的深度改革作了理性而系統的超前構想。³⁶

顧准的思想富礦與精神富礦，遠未被深入開掘。

21世紀，當中國改革邁向雄關、穿越險灘、登臨崇巒，顧准都將與我們同行。

³⁵ 李慎之於2002年1月26日、2月1日致作者函。

³⁶ 王元化於1998年2月9~13日審閱《顧准全傳》書稿時，與作者的談話。